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02-10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512

Hans汉斯

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的共生与消长

——霍克海默《理性之蚀》的理性批判路径探析

靳晓乐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4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6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5日

摘　要

本研究以霍克海默的《理性之蚀》为核心文本，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分析霍克海默笔下理性的异化过程，即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在历史条件中的共生消长关系，最终主观理性代替客观理性。此过程导致理性失去批判自身的功效，沦为纯粹的工具与手段，是现代社会理性危机的根源。本研究依次对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的哲学内涵进行界定，分别阐释二者的历史地位与进步意义，论证主观理性的膨胀过程与理性发生异化的内在关联。本研究对霍克海默的理性批判理论进行了再度挖掘，以期对现代社会理性异化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重建理性的价值判断功能。

关键词

霍克海默，理性之蚀，主观理性，客观理性

The Symbiosis and Ebb-and-Flow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

—A Study of Horkheimer's Critical Path of Reason in *Eclipse of Reason*

Xiaole Jin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October 4, 2026; accepted: October 26,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5,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Horkheimer's Eclipse of Reason as its core text and, through close reading,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the alienation of reason as depicted by Horkheimer within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namely, the symbiotic yet confli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reason and objective

文章引用: 靳晓乐. 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的共生与消长[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02-108.
DOI: 10.12677/acpp.2026.1511512

reason under changing historical conditions, a process culminating in the replacement of objective reason by subjective reason. This transformation strips reason of its capacity for self-critique and reduces it to a mere instrument and means, constituting the root of the rationality crisis of modern society. Proceeding in a step-by-step manner, this study first defines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objective reason and subjective reason respectively, then elucidates their historical status and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and finally demonstrat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xpansion of subjective reason and the alienation of reason. By re-examining Horkheimer's critical theory of reason, this study aims to offer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phenomenon of rational alienation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reby contribut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ason's function of value judgment.

Keywords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Subjective Reason, Objective Rea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中对现代理性危机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洞察出理性由原先把握世界内在秩序的认知能力退化为纯粹工具手段的异化过程，这便是“理性之蚀”的核心内涵。在该著作中霍克海默区分了主观理性(subjective reason)与客观理性(objective reason)这两种理性形态，作为将理性内在于世界本体秩序中的客观理性，更加强调价值本身的合理性；与此相反，主观理性则将理性异化为衡量价值与效率的合法工具，将理性本身的价值与真理向度转化功利向度。既有的研究更多聚焦于霍克海默的启蒙批判和技术理性批判([1]: p. 24)，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技术观为切入点，分析以技术代表的工具理性从启蒙时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影响([2]: p. 87)，而本研究则在此基础上对理性内部进行细化，以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共生消长关系的视角，梳理二者的概念内涵与发展演变，分析二者的辩证关系，探讨主观理性逐渐代替客观理性从而导致理性异化现象的内在运动机制，对现代社会的理性危机进行批判性反思，以期为重建理性的价值判断功能提供理论参考。

2. 客观理性的概念及其哲学脉络

在霍克海默的《理性之蚀》文本中，“理性之蚀”这一隐喻的展开是以客观理性的概念阐释为起点的，因此我们要先澄清客观理性的哲学概念以及在哲学史中的发展脉络，以便更好把握客观理性的核心特征，更加清晰和准确地理解主观理性取代客观理性的历史进程。

2.1. 客观理性的哲学内涵

客观理性作为霍克海默理性批判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具有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前提。客观理性是内在于客观世界之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体，不是人的主观思维感知与把握的结果。“这种观念将理性的存在认定为一种力量，而此种力量不仅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也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比如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于自然之中，以及在自然的各种表现之中。([3]: p. 2)”霍克海默将这种理性视为整体的综合体系和分级结构，包含了所有的存在者(beings)及其相互关系，旨在揭示现实的内在秩序。在这种宏大的理性本体论中，人类与其目的被包含其中，个体与“总体”的和谐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理性，在此语境中人的地位退居第二，人的地位为客观理性让步，

个体的价值取决于个体在世界整体框架中的位置与秩序是否恰当。

在霍克海默的手段与目的的论述中，着重强调客观理性的核心是目的优先于手段，即客观理性预设了人类的某种终极目标，即关乎事物本身的内在目的和“至善”。人之所以能够过合理的生活，是因为人能够认识并顺应这种内在于世界的客观秩序，从而达到个体与世界整体的和谐统一，达到某种类似于天人合一的境界。

2.2. 客观理性的哲学史追溯

霍克海默认为客观理性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中，他将客观理性的概念追溯到了古希腊的柏拉图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致力于去证明，依据客观理性生活的人也就会拥有成功、快乐的人生。([1]: p. 3)”表明宇宙的内在秩序与人类自我发展并追求幸福的诉求是相互契合的，对宇宙内在秩序的思考代表着对“真”的追问，对自我发展的诉求代表着对“善”的追求，二者的结合体现出古希腊时期真与善的统一。柏拉图所述的客观理性带有目的论的成分，他将追求客观理性当作目的本身，同时柏拉图对客观理性这一概念有着本体论上的认同，这与其理念论学说相符合，即在柏拉图理念论的视角下，处于理念世界的理性是超越人类思维的产物，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

这种理性本体论立场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与“目的因”学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系统化，理性本身不光具有特殊的形式，而且理性本身便指向目的，理性在客观世界中具有独立于人的形式，并且还具有独立于人的能动性和目的性。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与神学目的论结合后，确立了理性作为某种客观性的体现，成为宇宙神圣秩序的体现。步入近代，笛卡尔对主体与客体进行明确的区分，“我思故我在”的存在论声明将主体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受此影响理性的客观性给人的主体性让位，理性逐渐彰显人的认知地位。在黑格尔的“主体即客体”的体系中，客观理性得以复归，以“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逻辑形式保留了理性统摄历史与现实的宏大架构。以上历史脉络表明，客观理性曾长期作为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具有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

2.3. 客观理性的核心特征

其一，客观理性是目的优先于手段的。理性首先关注的是事物内在的价值与目的，而非仅仅关注实现目的的手段与效率，后者是主观理性侧重关注的领域。客观理性应当追问“目标本身是否值得追求”这一根本性问题，即追问目标本身的合理性问题，这是具有价值判断的理性，是具有内容内涵的理性，与工具化的理性不同。

其二，客观理性具有关于终极问题的实质性内容。客观理性包含对终极目的和至善的追问，关于什么是公正、平等、幸福、善等概念的反思，都是客观理性所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具有实质内容，必须与一定的历史时空环境相结合的，而非空洞的逻辑形式。从这方面看，客观理性所关注的更多是科学无法验证的价值判断问题。

综合来看，客观理性是一种本体论的承诺，其确立了理性的本体论地位，让理性独立于人。同时客观理性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能力，是关于事物意义与价值的判断，在把握这种理性的过程中，需要认知活动的参与。霍克海默描述“越来越多的理念变得理所应当、变得工具化，人们对其所含意义的认知就会越来越少。([1]: p. 21)”作为认知能力的客观理性，其功能在于不断反思人们对于遮蔽的意义与价值的觉察。它要求主体不断突破既定事实的束缚，去揭示被工具化思维所掩盖的社会矛盾与人性异化，从而恢复理性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张力与规范力量。

3. 主观理性的概念及其确立

以客观理性为代表的本质主义构成了西方哲学自古以来的主流传统，主观理性则是在这一主流传统

之中逐渐萌发，并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思想力量。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中超越了固有的将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进行二元对立的视角，将主观理性理解为理性在自身发展历程中发生的结构性转变，理性从现实的内在秩序转变为自我持存的工具。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转变，我们需要先澄清主观理性的哲学内涵，再分析主观理性在思想史中所带来的历史进步与积极影响，最终通过对主观理性整体发展脉络的把握，探讨主观理性的局限性。

3.1. 主观理性的哲学内涵

霍克海默认为“主观理性从根本上来说关注的是手段与目的，关注所采用的程序是否利于达成目的，这里的目的或多或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或者是无需解释的。目的本身是否合乎理性对它来说几乎是不重要的。([1]: p. 2)”与客观理性不同，主观理性是关注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理性，它已经将目的本身预设为既定前提，因此不再追问目的本身是否合理、是否正当这一类关于目的的终极问题。

缺少了对这类终极问题的追问，主观理性便退化为一种工具性的计算能力或者纯粹的逻辑形式，主观理性将自身从对实质内容的追问中彻底脱离出来，转而关注如何以最高效、最便捷的手段完成预定目标。在主观理性的视域中，最终目的与理性所揭示的价值无关，最终目的成为主体基于自身需要所合理设置的欲望目标，手段是否有效成为衡量理性的唯一标准，主观理性将“什么是合理的”问提，置换为“什么是对‘我’有利的”计算。于是理性的合法性发生转变，表现为从先前理性与客观秩序相契合，到理性须符合手段效率最大化。

主观理性从根本上无法接受任何超越个体利益或既定目标的终极价值，客观理性的目的可以因自身而合乎理性。在客观理性看来，理性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在于理性有着终极追求，能够追问事物内在的终极目标，并因此规定人类的生活方向；而主观理性则认为理性仅仅是主体为了实现自身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工具本身不具备善恶属性，不具备内在的价值，工具只有效率高低。主观理性是主体对于世界所抱有的工具性态度，它将世界视为可被计算、操控和利用的客体集合，而非具有内在意义和价值的整体。

3.2. 主观理性的历史进步性

尽管主观理性被霍克海默进行广泛批判，但霍克海默并没有简单否定主观理性的力量，他深刻发掘出了主观理性的历史进步价值：主观理性在打破中世纪以来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在推动现代科学发展与启蒙运动发展中所发挥出来的重要作用。霍克海默明确指出，思想的主观能力在面对宗教权威和传统迷信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是启蒙运动赖以展开的思想根基，它使个人从宗教神学和封建思想的权威中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让人能够以自身理性的理想去审视世界，利用世界，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文艺复兴和近代哲学中，主观理性推动了认识论的转向，确立了以主体为中心的认知范式。主体在认知过程中所具有的优先性与能动性，使理性从对超验本体的沉思转变为对经验世界的实证考察与建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都是主观理性确立自身合法性的标志性事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极大地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和现代技术文明的兴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也确立了主观理性的历史地位。

另一方面，霍克海默认识到主观理性在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也留有诸多历史问题。主观理性在批判客观理性的过程中，往往将客观理性所蕴含的价值规范一并抛弃，这为主观理性自身的膨胀与恶化埋下了隐患。

3.3. 主观理性的异化

主观理性在确立历史进步地位时，逐步异化为一种消解价值根基的力量，从关注手段与目的到消解

目的本身，最终导致理性的自我消解。在主观理性的支配下，概念内容经过了不断地简化，任何超出本源的概念运用都被视为“迷信”被剔除出去，迫使概念成为纯粹的计算工具与分类符号，丧失了概念原本该有的丰富内涵与本质规定。这种概念内容的贫乏化使得世界被还原为可量化的数据流，事物的独特性与质的差异被消解，只剩下功能上的关联。

此过程导致真理的标准成为可计算化和概率化的，真理这类具有终极指向的价值问题在主观理性的审视下，从对客观内在秩序的追问，沦为了对规律的统计和对概率的判断。“理性是人类最高等级的智识官能，它仅仅关注工具，甚而至于理性自身就是一种工具。([1]: p. 98)”理性的工具化既是理性自我异化的表现，又是理性走向自我否定的必然过程。

当理性彻底沦为工具，它便失去了反思自身所具有何种目的方向的能力，于是带来价值根基丧失的问题，出现“价值中立”的假象。霍克海默指出，“正义、平等、幸福、宽容”等具有价值判断的概念，在被剥夺客观内容之后，沦为纯粹的符号，丧失了其应有的伦理约束。当一切价值都被还原为手段与目的的计算，当“至善”不再具有客观的理性基础而仅仅是主体偏好的表达时，理性便完成了从现实的内在秩序到自我持存的工具的转变，此过程便是“理性之蚀”这一隐喻的核心内容。

4. 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的辩证关系

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在西方哲学史上呈现为复杂的动态关系，这种动态关系与简单的二元对立不同，二者是相互渗透、彼此制约的辩证统一体。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一直处于共生状态下，在历史的长河中此消彼长，主观理性在取得优势地位之后，导致了理性的自我异化、自我颠覆，而理性形式化和工具化的双重演变进程构成了“理性之蚀”的内在根源。梳理这种辩证关系，是理解霍克海默理性批判理论的关键所在。

4.1. 二者的历史性关系

在《理性之蚀》中，霍克海默认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处于历史性关系中，伴随历史条件的演变二者不断变迁，其演变方向反映了人类认知方式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历史上，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就一直存在，二者不是先后替代的线性关系，二者共存于理性的概念中，经过了漫长的历程，主观理性逐渐消解客观理性并取得优势地位。

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被视为宇宙内在的逻各斯(Logos)，人类理性的任务在于发现并顺应这种客观秩序。此时主观理性虽已萌芽，但主要服务于对客观真理的认知与践行，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柏拉图将理念世界视为理性所把握的最高对象，亚里士多德强调理性对自然目的的思索。在这一阶段，理性与客观普遍的宇宙相关联，理性被理解为一种认知和顺应宇宙秩序的能力，用以指导人类的生活实践，实现个体与宇宙秩序的和谐统一。在这种语境下，主观理性被纳入客观理性之内，被视为普遍合理性的表现，尚未获得独立的主导地位，个体理性活动的意义便在于它参与了理性的宏大结构中，指向了对终极真理的追求。进入中世纪，神学占据统治地位，在前期的教父哲学中，理性被视为信仰的对立面受到打压，随后得到承认，逐渐被整合进神学框架，服务于对上帝意志的理解。此时的客观理性表现为神圣的秩序，主观理性则体现为经院哲学中的逻辑推演，二者在神学目的论下维持着一种特殊的平衡。

然而这种平衡与和谐并不是一成不变地，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与近代科学的兴起，理性与宗教的论证以及理性与自然的分离，推动了主观理性的逐步崛起。尤其在启蒙运动中，主观理性被视为批判宗教权威与传统迷信的武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于是“启蒙运动是帮人们摆脱宗教的统治，但是却又被宗教统治着人类”([4]: p. 24)主观理性呈现出狂飙突进式的发展态势。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

代，主观理性彻底摆脱了客观理性的束缚，完全实现了其支配地位；客观理性则退缩至边缘，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客观理性的边缘化和主观理性的不断膨胀成为理性发展演变的主要趋势，这一漫长消长过程，是理性之蚀在历史维度的展开。

4.2. 主观理性的自我颠覆

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中揭示了一个理性的转折问题：主观理性在取得支配性地位之后，并没有带来所承诺的理性的全面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反而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导致了理性的自我颠覆，表现为理性自身丧失根基，逐渐走向非理性。

主观理性这种自我颠覆的逻辑，体现为对目的评判能力的消解。主观理性的核心特征是手段与目的的计算，它追问的是如何有效地完成目标，其中便蕴含着将目的视为给定的，目的本身便是合乎理性的，是无需追问的前提。当一切目的被还原为自我保存的终极目标时，目的之间便失去了可比较的理性基础，因为当多个目的都服务于自我保存时，对其进行比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给定的多个目的共同作为手段效力于另外一个目的时，形成目的与目的之间参差多态的状态时，不同目的价值差异才是值得讨论的。因此主观理性在逻辑上无法对目的本身进行批判，丧失了对行为进行价值引导的功能，彻底沦为纯粹的工具化计算。

主观理性在驱逐盲信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非理性的盲信，主观理性将一切客观价值视为虚假的内容并进行消解，同时这种消解活动本身则预设了某种客观价值标准，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导致理性的批判功能陷入瘫痪，丧失合法性依据。主观理性在驱逐盲信过程中，不知不觉缔造了新的神话，即对自我保存和效率计算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具有极强的非理性因素，它不需要通过中世纪那样神学上的狂热论证，而是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效率的名义进行自我确证，自我持存。

4.3. 形式化与工具化的双重进程

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在历史中互相消长的过程，是通过形式化和工具化两种互为表里的机制实现的。形式化是指理性在认知过程中逐渐剥离具体内容，转而关注思维结构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这种抽象过程导致了意义世界的贫乏。当理性只满足于逻辑形式的自洽而忽视实质内容的真理性时，它便无法触及事物的本质，只能停留在表象的操作层面，沦为纯形式的计算外壳。工具化是指理性屈从于外在于它的内容，比如被社会历史进程所控制，沦为服务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在这种进程下，理性无法起到批判的作用，丧失了独立性，成为维护既定秩序的辩护工具。霍克海默对工具化理性的认知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一方面，他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如何利用技术工具实施种族灭绝；另一方面，他观察到垄断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科学技术实现对社会心理的操控。同时西方理性主义本身就存在内在问题：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精神逐渐窄化为工具理性，最终导致“理性被工具化，科学被去价值化”([5]: p. 9)。

形式化使理性被掏空内容，成为纯形式的外壳，这恰好为理性工具化的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理性被抽空了实质性的价值内涵，它不再具备批判与反抗的能力时，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理性，很容易被外在的力量支配。另一方面，工具化又加速了形式化的进程，因为如果只用经济管理和技术生产的标准衡量理性，可计算性便成了理性的唯一量化标准，不可计算的价值维度被彻底放弃，理性的形式化只会被进一步加深。

综上，形式化与工具化互为表里，共同造成了理性内容的彻底空洞化与价值维度的全面丧失，最终导致启蒙走向其反面，从解放的力量异化为新的统治工具。这便是霍克海默所揭示的“理性之蚀”的深层逻辑。

5. 结论与当代启示

霍克海默提出的“理性之蚀”命题，指理性的自我异化过程，理性在保持外在形式的过程中丧失其实质性内涵，开始走向自身的对立面。这种理性的自我否定与异化，具体包含了认识论、价值论和社会历史三个层面的退化。

认识论方面，理性从把握实在本质的力量退化为分类计算，概率推演的技术程序手段，理性不再追问世界是什么而只关心如何操作，失去了对真理的整体性追问，因而无法在碎片化的经验材料中完整构建世界。价值论方面，传统中的客观理性追求真与善的统一，理性既要认识真理，又要实现善的价值。但在主观理性中，善的价值不再是理性所能论证和追求的对象，而被归入情感和权力意志的领域，导致理性丧失了为人类生活提供规范性方向的能力。社会历史方面，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变，理性从解放人类自身的力量转变为支配的统治工具，启蒙时期的理性以对世界的探索为目标，将人类从神话与宗教的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随之而来理性作为工具时，发生了异化，代替神话与宗教成为对人的新的支配形式，即“启蒙理性在祛除神话的同时，自身却沦为新的神话”([6]: p. 76)。这三重含义相互交织，层层递进。认识论上的碎片化导致了价值论上的虚无化，进而为社会历史层面的支配与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辩护。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理性是否已经变得无可救药？霍克海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乐观地指出必须通过批判和反思来拯救理性，重建理性同价值、事实和规范之间的内在联系。霍克海默的理性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对拯救理性的一种尝试，批判理性意味着试图去恢复理性尚未完全丧失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能力。同时霍克海默承认无法再回到前现代的客观理性时期，因为传统中的客观理性包含着过多独断论的因素，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霍克海默将理性的复归寄托于一种持续的批判实践，需要一种永不懈怠、永不停歇的思想努力，拒绝将现存秩序视为理所应当，不断揭露主观理性对主体的异化，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重建理性的解放潜能。基于之前的具体分析，应对“理性之蚀”的现代困境，需要从哲学层面的呼吁转变为具体的文化教育实践，其一，在教育领域，应该重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机制，使受教育者既要掌握工具性知识技能，也要具备对目的本身的反思能力与价值判断。其二，在文化与哲学层面，应重视对“至善”“正义”等概念的讨论，批判将价值问题简化为成本收益等计算问题的技术观，应在具体问题背后不断追问理性服务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的本质抉择在于：人类究竟是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还是堕入前启蒙时期([7]: p. 1)。在当代语境下，唯有实现对理性的不断反思与追问，将其重新锚定在人的解放这一价值基点上，才能避免“自我毁灭式的启蒙”，从而在工具支配下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与自由尊严。

参考文献

[1] 高岩.《启蒙辩证法》视域下的技术理性批判[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0, 41(3): 23-26.

[2] 刘光斌, 石夏丽. 从技术统治走向技术民主化——《启蒙辩证法》的技术观及其后续影响[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20, 22(5): 82-87.

[3] 霍克海默. 理性之蚀[M]. 郑兴,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4] 贾凯芳. 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9(12): 24-25.

[5] 李大棚. 科学技术为什么会被推到人性的对立面——论霍克海默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1, 31(5): 7-9.

[6] 王欣. 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J]. 学理论, 2014(34): 76-77.

[7]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